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早期鲁迅和日本文学

刘柏青

对鲁迅研究国民性问题的

再认识

邵伯周

为探索人生而烦闷的爱的

哲学家

范伯群

曾华鹏

一九八〇年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述评

张建勇

辛宇

北京出版社

1981

3

1981-3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北 京 出 版 社

封面题字：朱东润

封面设计：张 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八一年 第三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合编
北 京 出 版 社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70,000 字

1981 年 9 月第 1 版 198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760

书号：10071·367 定价 1.00 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八一年

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

一个被简单化了的主题

——关于鲁迅小说及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发展中的

个性主义问题 支克坚 · 1 ·

对鲁迅研究国民性问题的再认识 邵伯周 · 20 ·

早期鲁迅和日本文学(一) 刘柏青 · 39 ·

论鲁迅前期译介俄苏文学的意义 李恺玲 · 51 ·

鲁迅和周木斋

——四十多年前文坛上的一桩公案 唐 弢 · 72 ·

鲁迅创作思想漫谈

——《鲁迅论创作》编后记 王士菁 · 80 ·

全面才能深入

——漫谈鲁迅研究 潘旭澜 · 90 ·

走向世界

——《鲁迅传》之一章 林 非 刘再复 · 96 ·

鲁迅书信考释 王景山 · 114 ·

纪念茅盾同志

- 茅盾给曾广灿的一封信 126 •
 附：和茅盾同志的一次通信 曾广灿 • 128 •
纪念沈雁冰同志 孙席珍 • 131 •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

- 日本鲁迅研究名家名作述评（一） 严绍璁 • 136 •
创新的古典作品
 ——鲁迅的《呐喊》与清末谴责小说
 〔苏〕谢曼诺夫作 李明滨译 • 155 •
-

作家作品研究

- 为探索人生而烦闷的爱的哲理家
 ——《冰心评传》之一章 范伯群 曾华鹏 • 167 •
留下履痕的诗人——戴望舒 鲍 晶 • 195 •
肖红创作初论 邢富君 陆文采 冷淑芳 • 215 •
论曹禺剧作中的“间色” 王世德 • 234 •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书籍序跋五题 王 瑶 • 248 •
-

青年

论丛

探索者的得与失

——路翎小说创作漫谈钱理群·265·

谈谈《雷雨》中的周蘩漪

——与钱谷融先生商榷周 音·280·

心灵的光彩

——读《荒煤短篇小说选》有感.....岩 冰·291·

现代名篇赏析

醉人的绿，醉人的美

——读《绿》刘泰隆·298·

资

料

一九八〇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张建勇 辛 宇·303·

文学研究会之群(上)

——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钱光培 向 远·322·

“女兵”谢冰莹.....阎纯德·340·

作家访问记

“诗应是通向人民的”

——艾青同志谈他过去的创作陈 山·350·

一个被简单化了的主题

——关于鲁迅小说及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发展中的个性主义问题

支克坚

一九一五年，以《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中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发生的时候，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启蒙运动。一九一八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且最终决定了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的方向。即使如此，新文化运动也没有完全失去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特点。主要的证据之一，是它在对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的揭露和批判中，十分自然地遵照欧洲中世纪资产阶级反对神权斗争的逻辑，提出了关于“人”的问题。一九一八年，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介绍易卜生的观点：“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同年，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认为中国正应该象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重新发现“人”。鲁迅更痛心于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中国社会的野蛮、黑

暗、愚昧、落后，疾呼“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发展“纯洁聪明勇猛向上”^①的“人”。他认为，这严重地关系着我们民族未来的命运，因为：

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②

由于这样的情况，在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中国现代新文学，便在一开始就把个性主义的问题当作了一个重要的主题。本来，那些仅仅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同历史唯物主义十分隔膜的人，他们所谓“人”的问题，也不过就是个性主义的问题。他们反对专制主义加之于人的物质和精神的枷锁，要求个性的解放，个性的自由发展，以为这是人基本的权利，价值之所在。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里的田亚梅女士，经过陈先生的启发，认识到自己的婚事“该自己决断”。靠这点“人的觉醒”，她不顾父母反对，坐进了陈先生的汽车。淦女士的短篇小说《隔绝》里那一对男女青年的恋爱遭到家庭的反对，眼看将演出一场悲剧。女主人公在给爱人的信中说，他们虽然“学问上不能对于社会有所贡献”，却“总未向过我们良心上所不信任的势力乞怜”，并替同时代的青年“开了为要求恋爱自由而死的血路”。她的话里也表现着更加明确的觉醒了的“人”的意识。照她看来，不管怎样，他们是为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作了不屈的奋斗，因此，“我们的精神我们自己应该佩服的”。

然而，人类历史上有时会有这种情形：那最初唤起人们变革的愿望、为人们设定变革的目标的思想所设定的目标未必是合适的，由它来指引人们实现真正的变革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其所以能在社会生活中发生某种作用，自然都有历史的根据；但历史的前进又有自己的道路，以致有时只经过短暂的岁月，一度时兴的思想就被抛在后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个性主义促使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惊醒，发出反抗的呼喊，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

的软弱，中国人民已经不能仰仗个性主义来推翻封建主义，中国的前途也已经不可能再是资本主义。所以，象《终身大事》一类作品，虽然描写了一点当时青年男女婚姻不自由的现象，表现了一点反封建的要求，而具有某种现实主义的因素；却又误认为依靠个性主义，依靠追求个性解放，就可以解决青年男女婚姻不自由这个严重而且绝非孤立的社会问题，从而根本违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也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现实主义可言。胡适自己称《终身大事》为“游戏的喜剧”；事实上，在现代中国，在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的范围内，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必然具有悲剧的性质，象《隔绝》所表现的那样。当然，《隔绝》的现实主义，还远远不是革命的现实主义。

在新文学初期的浪漫主义作品中，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却曾经展现过别样的风光。试看郭沫若《浴海》一诗的下列诗行：

太阳的光威
要把这全宇宙来熔化了！
弟兄们！快快！
快也来戏弄波涛！
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
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
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
全盘洗掉！
新社会的改造
全赖吾曹！

可以看到，郭沫若的眼光超出了个人幸福的界限，他把追求一种新人，同追求一个光明的新社会结合起来。鉴于理想本身的抽象，诗人还往往只能用象征的、比喻的手法来表现。一旦具体地来描写现实，那么，象郁达夫的《沉沦》等作品，由于主观色彩浓厚，其中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又复成为悲剧性质的主题了。郁

达夫也把发展人的个性同改造社会两者联系在一起，但他面对着社会浓重的黑暗，极感个性主义的软弱，为此陷入悲观并产生出一种愤激加颓废的情绪。所以，不管郁达夫早期的作品，将主人公的思想情感表达得多么率真、真实，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在当时又有着怎样的社会根据，它们和郭沫若的《女神》不同，不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然而它们并不要求返古、倒退，因此也不能断作消极浪漫主义的作品。

本文将不再详细论述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在新文学初期各类作品中的不同形态，而要来集中研究它在当时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中，得到了怎样的表现，以及它后来随着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又得到了怎样的表现。从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开始，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对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认识和处理上的特点，使得新文学终于清楚地区别于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文化，显露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因此，它体现着新文学的方向，关系到新文学的优点和缺点。也就是说，新文学不仅仅有优点，还有缺点，缺点也是从鲁迅小说就开始了。我们要说的鲁迅小说和新文学的缺点，不能由鲁迅和新文学其他作家来负责，乃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所造成。今天，距离五四文学革命已经六十多年，为了对鲁迅小说和其它一些新文学作品做出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科学的评价，该是正视这些缺点的时候了。

在非常广泛、非常笼统的意义上，鲁迅《呐喊》和《彷徨》两本集子所收的小说，假使不是全部，也大多与个性主义的问题有关。鲁迅揭露“国民性”的弱点，揭露“国民性”堕落的病根，他同时也是在描写被毁灭了的个性，要求人的个性的合理发展。但在鲁迅的小说中，直接描写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的，表现出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开始阶段认识和处理这个主题最根本的特点的，是他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所写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

逝》等几篇：本文要据以说明问题的，也是这几篇。

有的研究者认为，《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吕纬甫和魏连殳的形象，表明了知识分子由脱离人民所致的软弱。可以这样来联想，可以把这作为它们的一种客观的意义；但是，如果以为鲁迅的创作意图就在于此，以为它们唯一的或主要的思想意义就在于此，那就大大值得商榷。因为，在小说里，无论作家具体描写的其他人物中还是作家所写的人物环境中，都根本不存在觉醒的、战斗的人民，连多少能给主人公一点力量和信心的人民也没有。倒相反，一切都反衬出两个主人公曾经怎样地“超群”。鲁迅自然十分真实地描写了依旧附着在他们身上的“古老的鬼魂”，但却又因为他们毕竟是沉睡着的中国人中间首先醒过来的分子，而把自己的深深的同情给了他们。《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当年曾和一些“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比阿Q为比赛捉虱子同王胡打架，为“生计问题”跟小D“龙虎斗”，他毫无疑问地要高出许多。至于《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不管在S城，在寒石山，能使人产生一点希望，看到一点光明的，除了他还有谁呢？没有了。那些群众，则恰恰构成了扼杀杰出人物的土壤。

鲁迅在他的小说里，不只一次地通过对比，描写中国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的觉醒和群众的不觉醒。问题在于，鲁迅《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等作品所描写的，是反动势力的强大和群众的落后不觉悟，怎样造成那些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的悲剧的问题。封建主义，依靠着它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影响，牢牢地控制着群众，所以也牢牢维持着自己的统治。少数知识分子拿起个性主义的武器，但无法刺透它的坚壁。一九一九年，鲁迅曾经引用过易卜生戏剧《国民公敌》中斯铎曼医生的话：“世界上最强壮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③。如果说《药》里那孤立的夏瑜，还是一个英雄，那么，吕纬甫和魏连殳，既孤立又无力，无力伴随着孤立。对他们，鲁迅确实有严肃的批判：他显然不满意于吕纬甫的模糊敷

衍，也不满意于魏连殳向环境报复的方式。但是，在鲁迅思想上，更多的是同情。他是带着惋惜的心情来描写吕纬甫看到过去常来眺望的酒楼后窗下的废园的。关于魏连殳，他两次用了以下象征性的描写：

……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里嗥叫，惨伤

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难道还看不出鲁迅对他的深情吗？我们分析《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包括这两篇小说在内的那本小说集的题目——《彷徨》；应该考虑到鲁迅当时的思想状况——“五四”退潮之后，他正进行一次新的探索。鲁迅没有可能提出知识分子必须同群众结合的问题，没有可能自觉地批判他们同群众结合之前的软弱。鲁迅为这些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首先觉醒的人，终究没能找到出路，而感到了极大的痛苦和哀伤。

我们不能因为鲁迅没有描写群众的觉醒和反抗，相反地描写了知识分子的首先觉醒，而向他提出指责。甚至对一些研究者将此作为鲁迅思想的一种局限，也须做具体的分析。从鲁迅在群众不觉悟的问题上，认识过于绝对——比如，他曾断言，中国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④来说，他的思想的确存在局限。但是，倘使以为必须把事情颠倒过来，就是说，在文艺作品里，群众必须写成英雄，知识分子则必须受到指责，写成反面的或转变的人物，那就大错而又特错。难道“五四”时期，在有关政治和世界观的问题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去向指引着时代潮流的先进思想学习，而要向处于自发状态的工人和小生产以及封建宗法思想影响下的农民学习吗？而有条件向时代的先进思想学习的知识分子，他们先于工人、农民而觉醒，实乃出于必然。所以，鲁迅的描写，不但不错，反而应当肯定它有重要的意义，道理就在它反映了事实，揭示了真理。

有人要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量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鲁迅写的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武器是个性主义。事实如此。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在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同个性主义的问题，本来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拿起个性主义的武器，意味着从这样的统治下觉醒。事实是，如果没有个性主义的觉醒，也就没有真正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觉醒，例如过去的农民，他们对封建统治者满怀仇恨，到头来却不过是想将彼取而代之。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治上思想上都拿不出自己的货色；于是，替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找到个性主义的思想武器的，就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了。所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拿起个性主义的武器，恰恰是表明了他们的首先觉醒，在工人和农民之前，特别在农民之前觉醒。

但个性主义的缺点是明显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它的缺点尤其明显。既然中国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就不能找到与自己相应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其结果，它没有刺透封建主义的坚壁，自己反被折断。那些拿起个性主义的武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终究不能在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的同时，实现自己作为“人”的发展。他们要么找到别的前进的道路；否则，将成为一种新的类型的被毁灭的人，新的类型的悲剧人物。

正因为如此，鲁迅没有把吕纬甫和魏连殳写成英雄，他们恰恰是上述的后一种类型的人物。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到，新文学开始阶段的革命现实主义，继把人的个性问题同革命的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之后，处理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的进一步的特点了。要知道，此时此刻，鲁迅思想的探索，并非一般的探索，而是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探索，现代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因此，他描写吕纬甫和魏连殳，虽然首先觉醒，却找不到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可以与之结合，终于导致悲剧，是他对以个性主义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的否定，是他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迈出的

重要一步——即使眼下他还只是否定了过去，而没有能够为未来肯定什么。《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其所以客观上会产生如下的意义，就是知识分子倘若不同群众结合，便无法克服自身的软弱，道理也就在这里。象这样的作品，胡适的《终身大事》不能相比；淦女士的《隔绝》一类，虽然描写了个性主义的悲剧，但由于把问题局限在个人幸福上，不能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知识分子的道路的高度着眼，拿来相比，也显得逊色许多。

我们在前面说过，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文化，把“人”的问题作为中心的问题；而它所谓“人”的问题，又具体地表现为个性主义的问题。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既然否定了以个性主义为武器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否定了与此相联系的实现人的权利和价值、发展人的个性的可能性，它便同资产阶级启蒙主义分手了。然而，个性主义，虽然由于它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而已经过时，它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人的权利、人的价值的问题，人的个性发展的问题，假使不是因为它们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实质，那么，在一般的意义上，它们始终是合理的。进一步说，为了社会的进步，提出这些问题，始终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拿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但不应当抛弃这些问题，而应当根据本阶级的世界观，根据马克思主义，赋予它们新的含义，继续为它们的真正解决而奋斗。一句话，无产阶级的革命，仍旧必须为了“人”，一种新的“人”。象吕纬甫和魏连殳，他们反抗黑暗，要求发展自己，无疑是进步的。但小说或明或暗、或虚或实地描写的他们反抗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却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是集体主义者而是个人主义者。因此，他们的失败，他们的毁灭，都包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他们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无法挽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应该得到发展；相反，他们仍旧应该得到发展，不过是在别一条道路上，成长为别一样的人，即上面说的一种新的“人”。

但历史在它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往往会给人们造成一些假象。中国现代现实生活中个性主义作为改造社会的武器的破产，许多新思潮影响下追求个性解放的人们精神乃至肉体的毁灭，教育人们另行寻找改造社会的路，同时也使人们对人的权利和价值重新发生怀疑。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权利和价值一向受到蔑视的中国，人们一旦发现，那大家刚刚熟悉的“人”的口号带来的不过是幻灭，而他们对工农革命的风云又还很不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怀疑的发生和滋长，乃是极为自然的事。在文学的领域里，实际上便是出现了下面的情形：由中国现代的历史条件所决定，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当它匆匆忙忙地向前走的时候，误将它应当从启蒙主义那里继承下来，加以改造，提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度的问题，丢到一边了。

这种情形，我们甚至在鲁迅的小说里也可以看到。鲁迅对于今后的斗争中仍须提出人的权利和价值的问题，人的个性发展的问题，是不是也发生了怀疑呢？一九二五年三月，他在一封信里说：“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⑤ 鲁迅有正确的一面：任何情况下，人的个性的发展，都要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不仅封建专制主义对它实行压制，其它各种因素也给它以限制。但还有另一面：任何情况下，人总应当为历史条件许可的个性的健康发展而斗争；倘若看到信奉个性主义的人追求个性解放失败，就不再提人的个性发展问题，人的权利和价值的问题，那就失之绝对化了。鲁迅的认识实际上有这种倾向。如果说，《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还不能做为证据，在《伤逝》中，它就表现得比较明显。

《伤逝》是鲁迅最著名的小说之一。表面上，它似乎比《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后退了一步，即从直接的社会改造，又回到了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问题上。但在实质上，它的主题并未后退，相

反有所前进，这就是它涉及到了追求个性解放失败之后、“人”毁灭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小说里，女主人公子君讲过一句著名的话：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子君的具体情况，这句话，是惊人的勇敢的话，所以也是极为感人的话。但子君后来的表现和她的结局却表明，这句话竟至一钱不值！我们当然不能对她提出什么责备，她是从精神到肉体，都被那个社会毁灭了。男主人公涓生最终认识到自己对子君的死负有责任，因而极感悔恨，决心要“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鲁迅细致地描写了子君那由爱产生、而且仅仅为了爱的“勇敢和无畏”，是怎样经不起打击；同样细致地描写了涓生的自私和卑怯；这些都是对个性主义的实质深刻的揭露。但是，当着鲁迅不仅仅抨击环境对于子君的压迫，而且如此严峻地——当然也是十分正确地——批评子君将自己的追求局限在爱情上的时候，关于在今后的斗争中，人的权利究竟是什么，人的价值究竟在哪里，等等问题，读者看到的，只是涓生的话：“人生的要义……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说得极对！人假使并不生活着，别的一切，都无从谈起。但不能反过来由此得出结论：人只须生活着，别的一切，都不必再谈；或者说，按其本质乃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他之所以存在，只为了活着。我们不是说鲁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问题在于，鲁迅明显地不想提供其它的结论。既然如此，“我是我自己的”这句话，就真正变得毫无意义；而涓生要寻找的“新的生路”，除去求生，读者也就看不出它同争取人的权利和价值，争取人的个性的发展，还有怎样的具体的联系。

于是我们看到，在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中，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开始被简单化了。具体的表现，是它在否定了个性主义可

以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描写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人仍旧不免于毁灭之后，如前面说过的，没有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提出个性主义针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所提出的关于“人”的一些基本问题，反而在实际上抛弃了这些问题。我们也看到了鲁迅小说的缺点：《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作品，标志着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结束，新文学一个时期的结束。它们虽然给下一阶段、下一时期的文学留下了最主要的问题——要探索和表现新的社会改造的路，却忘记了同时留下一些本来在新的探索中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或者说它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但也象我们前面说过的，这难道要由鲁迅来负责吗？事情的发展变化是如此迅速，人们的认识却总需要一个过程。鲁迅在当时，如果不这样写，又怎样写呢？

在新文学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直至三十年代，新文学许多重要作品的主题，还是鲁迅小说描写过的主题直接的、具体的继续、变化和发展，例如有关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罪恶的主题，有关农民以及其他个体劳动者状况的主题，再就是有关个性主义的主题，等等。鲁迅小说会有这样的影响，当然首先是因为，截至此时，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基本矛盾，尚未得到解决，但同时也说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开始的时代，新文学诞生的时期，鲁迅的小说，已经通过对专门选取的一定社会生活的非常独特的描绘，把一些有关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揭示出来了。它们因此而具有了一种类乎神奇的力量，仿佛把后来作品的主题都拴在了自己抛出的一根根无形的绳子上。大革命失败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鲁迅小说描写过的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在两类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变化和发展：一类是茅盾、胡也频、丁玲等作家的作品；一类是巴金、曹禺等作家的作品。

一九三四年，鲁迅回顾新文学走过的道路时曾说：

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